

中国共产党 建设史

下册

李君如 主编

Zhongguo Gongchandang
Jianshe Shi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人民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中国共产党 建设史



李君如 主编

Zhongguo Gongchandang
Jianshe Shi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福建人民出版社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共产党建设史 (上、下册) /李君如主编.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7-211-06357-4

I. ①中... II. ①李... III. 中国共产党一党的建设—
党史 IV. ①D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89817 号

中国共产党建设史

ZHONGGUO GONGCHANDANG JIANSHE SHI
(上、下册)

主 编: 李君如

责任编辑: 江典辉 林俊杰 孙 颖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591-8753316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jiangdianhui@sina.com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福州德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 福州市金山浦上工业区标准厂房 B 区 42 幢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7

字 数: 52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1-06357-4

定 价: 75.00 元 (上、下册)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下 册

目 录

第九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党的建设	285
(1966年5月—1976年10月)	
一、党的政治路线的错位和党内政治生活的破坏	285
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酝酿和提出	288
三、党的领导体制和组织原则遭到严重破坏	293
四、“左”的党建理论与实践进一步合法化	300
五、林彪集团覆灭与执政党建设的转机	307
六、四届全国人大与江青集团“组阁”梦的破灭	317
七、全面整顿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终结	326
八、执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与历史启示	340
第十章 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前党的建设	346
(1976年10月—1978年12月)	
一、揭批查江青集团，清除帮派体系	346
二、党内政治生活逐步恢复正常	350
三、中共十一大对党的建设的安排	352
四、初步平反冤假错案与恢复党的优良传统	355
五、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359



第十一章 全面拨乱反正时期党的建设 363

(1978年12月—1982年9月)

- 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党的自身建设新阶段 363
- 二、党的组织建设的新举措 369
- 三、提出党的制度建设的历史任务 378
- 四、《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完成了党在
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381

第十二章 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的党的建设 394

(1982年9月—1989年6月)

- 一、中共十二大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的
提出 394
- 二、中共十二大关于党的建设的新部署 403
- 三、建立离退休制度与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 412
- 四、中共十三大确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 418
- 五、中共十三大对党的建设的部署 426
- 六、推进领导制度和体制的改革 428

第十三章 国内外政治风波后党的建设 433

(1989年6月—1991年12月)

- 一、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全党对党的建设的重要性、紧
迫性的认识 433
- 二、坚持党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性质 439
- 三、开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 442
- 四、坚持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445



第十四章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党的建设 455

(1992 年 1 月—1997 年 9 月)

一、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开启党的建设新阶段 455

二、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加强党的建设 459

三、提出和实施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462

四、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 466

第十五章 面向新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 470

(1997 年 9 月—2002 年 11 月)

一、中共十五大确立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470

二、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基层党建的新路子 472

三、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迈出新步伐 474

四、全面深入开展“三讲”教育活动 480

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和执政党的建设的新突破 483

第十六章 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488

(2002 年 11 月—2007 年 10 月)

一、中共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 488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的形成 494

三、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和全面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 498

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 501

五、完善党的制度建设 514

六、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518



第十七章 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	521
(2007年10月—2011年1月)	
一、中共十七大构建党的建设总体布局	521
二、全党深入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活动	532
三、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542
四、建设学习型党组织	548
五、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552
六、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党的自身建设	558
七、加强反腐败制度建设	561
八、加强党的群众工作	570
没有结束的结束语	573
一、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573
二、增强党的先进性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全面推进党的 建设	574
三、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使命	575
四、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弘扬党的优良传统	579
五、深化改革创新，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581
后 记	584

第九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党的建设

(1966年5月—1976年10月)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在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的一次错误实践。这场政治运动的发生，既有社会历史方面的深刻原因，又有执政党的建设问题上出现的失误。它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一、党的政治路线的错位和党内政治生活的破坏

“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生有各种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由于党和毛泽东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等愿望出发，对我国阶级斗争的形势以及党内的政治状况作了错误估计，导致政治路线的严重错位和党内政治生活的严重破坏。

1. 党的政治路线偏离客观现实

“文化大革命”运动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从国际形势看，中国面临着多方面的公开和潜在的侵略威胁、战争挑衅与军事压力，周边环境并不安全。其主要表现是：首先，中苏关系随着两党公开论战的升级而急剧恶



化，苏联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中国不断施加压力，频繁制造边境纠纷和挑衅事件。其次，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战争不断升级，战火直指中国南方边陲，严重地威胁着中国的国家安全。从国内形势看，我国经过贯彻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的5年努力，经济状况大为好转，整个国民经济走上了比较健康的发展轨道；与此同时，干部队伍中也发生了一些多吃多占、贪污公款以及官僚主义等问题。从全局来看，中国共产党在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从1966年开始执行国民经济发展第三个五年计划，党应该在政治、思想、组织、作风建设等方面加强自身建设，以迎接新的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然而，由于国际国内客观形势的影响和党内“左”倾思潮的发展，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观点逐渐占据指导地位，最终导致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运动，党的政治路线出现重大曲折。

1965年九十月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一次扩大会议上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1966年3月底，在一次谈话中他又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宫。1966年7月8日，他在给江青的信中更进一步说：“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有些反党分子……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甚至有发生反革命政变的可能。^① 1970年12月，他在会见斯诺时谈到对“文化大革命”运动前夕党内上层状况的估计时说：“那个时期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② 由此，他得出结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7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7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党的阴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他说“文化大革命”运动实际上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不可否认，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其主观愿望是力图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维护党的纯洁性，寻求理想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巩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但事实证明，当时他对国际国内的形势、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严重地脱离了实际，夸大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其基本理论观点上的错误愈益完备和系统化，实践中的失误则越加严重。由于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威望，上述观点不仅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而且被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致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取得了支配全局的地位。加上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中共中央难以及时纠正其错误，而林彪、江青、康生等党内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上述错误，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爆发和长时间的延续。

2. 党内政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

“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在严重破坏党内政治生活原则的过程中发生的。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由江青、张春桥等共同策划、姚文元执笔并署名的大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由此，在文学艺术领域引发了一场是非混淆的政治批判运动，为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了舆论准备，成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的直接导火线。这篇文章批判的对象，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但北京市委、市政府领导对此毫不知情。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很多人的反对，仅《文汇报》编辑部就收到批驳该文的来稿来信3000多件。《人民日报》和北京其他各报在19天内也没有转载此文。然而，这一切反而加深了毛泽东对北京市委和中央一些领导人的怀疑与不满，认为吴晗有后台，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于是，由批吴晗而株连到同他合写《三家村札记》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和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以及刊载他们文章的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杂志和《北京晚报》。当时，凡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人均遭到批判，



有的甚至在后来被迫害致死。到1966年初，这一过火政治批判发展到史学、文艺、哲学等各领域，形成思想文化界广泛的批判运动，被点名的人越来越多，气氛也越来越紧张。

在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同时，经过林彪等人的策动，在军队中制造了一桩对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的政治陷害事件，以“篡军反党”的罪名将其隔离审查。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也受到诬陷，并被停止工作。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也以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被调离。

这样，从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掀起文艺学术领域里的政治批判运动，斗争逐步升级，加上当时接连发生的有关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受诬陷、被停职的严重政治事件，在党内外就造成了到处都有“阶级斗争”的紧张空气和中央果然出了“修正主义”的错觉，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终于酿成“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爆发。

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酝酿和提出

正确的领导，总是以正确的思想理论作指导，而错误的领导，必然有其错误的思想理论根源。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理论根源，就是当时大力宣传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1. 思想理论向“左”的方向发展

为了领导好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斗争，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于1964年）于1966年2月初开会，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并于2月12日经在京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向全党转发。提纲的主旨，是试图就这场学术批判运动的性质、方针、方式等问题加以适当的规定，使运动置于党的领导下和学术讨论的范围内。根据提纲的精神，中央宣传部没有同意发表关锋、戚本禹写的关于批判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的“要害”的文章。然而，1966年3月底，毛泽东在与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的谈话中，严厉指责“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中宣部不支持左派，“扣押左派稿件”，是“阎王殿”。毛泽东还说，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都要解散。毛泽东谈话后，中央书记处于4月停止了彭真的工作。

为了在全国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共76人。这时，毛泽东在外地，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但议程是按照毛泽东4月在杭州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部署进行的。会议共三项主要内容：

第一，根据林彪、康生等人的指控，把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打成反党集团，并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斗争。同时决定，停止或撤销他们所担任的领导职务，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进一步审查他们的反党活动。这不仅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展从组织上扫除了障碍，而且使党的组织原则开始受到严重践踏。

第二，会议在没有经过认真讨论的情况下，通过了会前由康生、陈伯达等人负责起草，经毛泽东几次修改定稿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因在5月16日的会议上通过，故后来被简称为“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集中反映了“左”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毛泽东对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错误估量，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第一份纲领性文件。

“五一六通知”在严厉指责“二月提纲”的同时，断言已有“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任，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身旁”，“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因此，对他们要“彻底揭露”“彻底批判”，“清洗这些人”，实行专政。不仅如此，“五一六通知”在



理论上还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把“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观点说成是“资产阶级口号”，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和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把政治问题同学术问题完全等同起来，全盘否定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无视对待历史遗产要批判地继承的原则，鼓吹“无产阶级的学术要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学术”的方针，为林彪、江青一伙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提供了可以利用的理论和政策依据，也给党的政治思想建设带来了极大危害。

第三，会议决定撤销“二月提纲”，撤销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以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通常简称中央文革或中央文革小组）。

“五一六通知”与“二月提纲”是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体现了党的两种不同的政治、思想、文化建设的指导方针。“五一六通知”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对党内外政治状况和国内外政治形势的严重错误估计，认为国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更加使他忧虑的，是党中央及省、市、地县领导层出了“修正主义”，他们已经变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党内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他把总结苏共党内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教训同所认定的上述情况联系起来，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及接班人问题表示深深的忧虑和关注，并把“文化大革命”运动看成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办法和途径。

5月18日，林彪在会上讲话时列举古今中外的政变事例，结合攻击彭、罗、陆、杨，大谈所谓党中央内部有人搞政变的谎言，竭力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使本不正常的会议气氛更加紧张。

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主要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这一指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的反



动学术权威”，依靠力量是“革命左派”。关于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方针和方法，一再强调要“敢字当头”，“不要怕出乱子”，“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文件中虽然也提出要正确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抓革命，促生产”，“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等要求，但它实际上带来的是一种盲目的、自发的、大规模混淆敌我的运动，其中一些正确的规定在后来的运动中从来未能得到贯彻。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还批准了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通知和有关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完成了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未完成任务，因而这两次会议便成为“文化大革命”运动全面发动的标志。两次会议标志着“左”倾指导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标志着党的政治路线和指导思想的严重错位，执政党的建设出现重大曲折，陷入困境。会后，刘少奇、邓小平等一些中央领导人相继受到更猛烈的冲击，毛泽东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他的个人崇拜也被神化。

从此，“文化大革命”运动就在全中国范围内迅猛异常地发动和开展起来。

2.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提出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作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指导理论出现，是以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为标志的，并被广泛宣传，写入中共九大、十大政治报告和党章，写入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修改后的宪法。

1967年11月6日，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以“两报一刊编辑部”名义写的《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一文，正式把“文化大革命”以来形成的“左”的理论确定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并把这一理论归纳为六个思想要点：（1）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2）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



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3)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4) 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分注意识破“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把那些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5)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6)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这篇社论是陈伯达、姚文元主持起草并经他们反复修改过的。他们在送给毛泽东的信上说：“这篇社论，又再作修改。关于主席思想六条，作了新的整理。列宁的话已经充分引了。大家很希望主席能看一看，并加以修改。”可见，这一理论的名称不是毛泽东概括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提法，在所看到的毛泽东之前的著作中从未出现过。社论归纳的六条，是把毛泽东的一些话串到一起，编起来加以解说。社论中用黑体字当作“毛主席语录”来发表的“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这一句话，也不是毛泽东的原话。他在“五一六通知”中写的原文是“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的专政”，社论里用的却是“全面专政”。虽如此，这篇社论还是经毛泽东同意发表的。他在陈伯达、姚文元送审的社论信封上批示：“内件已阅，修改得好，可用。”这样，“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就经毛泽东本人看过并同意后，成为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指导思想。在这一错误理论指导下，党的建设的指导思想带上了浓厚的“左”的色彩，党的思想理论建设走入



误区。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本意，是想通过这场“政治革命”来扫除他臆想中的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和修正主义，巩固社会主义成果，把中国共产党建设好，使中国发展得更美好。作为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他经常注意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方向，这是十分重要和可贵的。在当时严峻的国际环境下，他考虑会不会出现内外夹攻、亡国亡党的危险，这也是关系到全局的重大问题。但是，由于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样的错误指导方针，采取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样错误的方式方法，结果使探索出现失误。

当然，“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成那样严重的动乱局面，一个重要原因是毛泽东的错误被林彪、江青等人利用。正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给他们提供了实现野心的机会，他们把“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推向极端，蓄意煽动极左思潮，制造动乱，乱中夺权，对党的建设破坏极大。

总之，“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党的建设就是在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标志的“左”倾指导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主导地位、党的政治路线转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上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运动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样的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又没有政治基础，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

三、党的领导体制和组织原则遭到严重破坏

“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以后，由于党的政治、思想建设严重偏向“左”的轨道，致使在组织上个人专断、权力过分集中、“踢开党委闹革命”、“大夺权”等破坏党的领导体制和组织原则的现象发展到顶峰，给党和社会主义



事业带来极大损失。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上的一次深刻教训。

1.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并取代中央

“文化大革命”运动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破坏，是从1966年5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虽然由刘少奇主持，但会议议程和内容却由未到会的毛泽东事先确定，会议的实际操纵者是林彪、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并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更为严重的是，毛泽东还在“五一六通知”中写道：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此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就完全由中央文革小组所掌握，对毛泽东本人负责。

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康生是顾问，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是副组长，组员有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共13人。1966年8月2日，中央又决定陶铸兼任小组顾问，变成14人。根据中央要求，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各提名1人，共18人。但是，这个小组实际工作的只有14人。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过程中，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事和职权有过很大的变动。起初，从1966年5月至12月，中央日常工作由政治局和书记处开会决定（八届十一中全会前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全会后由周恩来、陶铸负责），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只列席参加，起参谋助手作用。后来，由于陶铸、王任重等人在中央文革小组内坚决抵制江青等人的不正常活动，江青、陈伯达、康生便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于1967年1月初将他们俩人“打倒”。刘志坚、谢镗忠、尹达、穆欣也先后因各种所谓问题被“打倒”。这样，不仅中央文革小组内剩下清一色的“左”派人物，而且中央书记处也完全停止了活动。中央虽未明确宣布撤销这一机构及其成员，但由于中央文革小组职权范围的扩大，加上书记处不少同志受到造反派的冲击而靠边站，实际上形同虚设。接着，1967年2月，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又以反所谓“二月逆流”的莫须有罪名，将李富春等7位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处理